

## 清末译者与读者关系考察<sup>\*</sup>

涂兵兰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 410205)

**提 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与读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清末社会伦理关系、政治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语境下,其译读关系呈现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师生关系、商客关系以及朋友关系。在任何一种关系中,译者都应该注意读者是译本生存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译者;读者;关系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110-4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u Bing-l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is a critical one in translating process. With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the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constrained to serve as the readers' tutors, friends or businessmen, which signifies that what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is, the latter is the crucial factor for the translated text to survive the market.

**Key words:** translator; reader; relationship

#### 1 清末社会时代特点

德国翻译功能派认为,任何人类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译者的目的受到各种社会情境因素的制约,如所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译者自身的社会需求以及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翻译主体等(Nord 2001: 1-5)。清末译者大多数是士人,士人很早就把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伦理模式。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代表,为士人阶层提出“士志于道”的价值规范和人生信念,并将“道”具体化为儒家士人的个体道德准则。他所提出的“内圣外王”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这样,清末士人译者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希望通过翻译成为正统教化伦理的传扬者和示范者,成为儒家伦理规范的体行者和实践者。

但是,由于时代剧变,士人社会政治观在清末

社会逐渐发生变化。清末以前,大多数士人的出路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只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其三是学幕,其四是学生意,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周作人 1982: 49)。清末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逐渐形成,使他们从思想上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取缔以后,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新式学堂的建立,士人凭借自身的知识谋取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依靠“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逐渐成为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仍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

因此,清末译者进行翻译大体出于两种目的:出于营利的需要以及出于救国的需要。在清末初期,翻译的大量盛行与清末的政局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局势的

<sup>\*</sup>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文学翻译家翻译伦理研究”(2012M521523)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翻译家的翻译伦理研究”(11YBA082)的阶段性成果。

附属品。它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工具,是达到改良目的的手段。清末接连几次战败更强化了译者的这种意识,因而在这段时期以“救国”为目的的翻译占主导地位,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翻译直到民国初年才越来越强势(涂兵兰 2012: 54)。

## 2 清末译读关系表现形式

### 2.1 师生关系

传统士人与大众就其伦理关系而言,是以精英的面目与大众构成“师生”关系。“师”在这里乃是一种“道”的人格化,它不是解决生计问题的职业,而是形塑大众、范引天下的神圣职责。知识分子的伦理职责是专制的,而且平时隐蔽得合情合理,一旦遇到社会伦理危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履行一个“导师”的职责,把大众从“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导向其“更高的生活概念”。清末社会衰微、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国家危机四伏,作为士大夫的代表,译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着一条捷径把中国的现状扭转过来。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利用翻译进行宣传,启发民众觉悟。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的选择和制造译文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篡改和造假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译者就与作家和政客一样,参与到了创建知识和打造社会这种权力行为中来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呼唤某种须要翻译的知识的时候,译者的选择往往会左右历史的走向(Tymoczko & Gentzler 2007: 4-5)。清末译者们把自己当成是范引天下的师者,试图左右读者的思想,提高“民德、民智、民力”。他们与读者形成了一种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称为“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就是“文以载道”。刚出道不久的包天笑发行《励学译编》,其目的是依靠苏州留日本学生杨延栋、杨荫杭等人译介日本的书刊,将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介绍给国内读者,开发民智。梁启超则认定一般民众不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如果要动员民众参与政治,首先得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觉悟,所以在他东渡日本后,对日本小说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认为翻译西方小说是译者们最好的教导工具。

夏曾佑的看法就代表了一部分译者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所以“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

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陈平原 夏晓虹 1997: 78)。在他看来,士大夫不须要读小说,小说是对身体的损耗,而只有妇女和粗人,层次太低,水平太差,却是不能不读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如此公开的议论盛行于清末,这一方面说明清末的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仍然顽固地植根于士大夫的心里;另一方面表示译者与读者在那样的环境里根本无法做到平等交流,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导致译者并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期待视野。士大夫们无论做文章还是翻译小说总是在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划上一个分界线,仿佛翻译作品是哀念小百姓的无知无识,所以降格给他们翻译点小说看。士大夫始终无法放下身段,走进民众。

就是后来的翻译家鲁迅谈到译文读者的分类时也说“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的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罗新璋 1984: 275)。鲁迅译书到底是给谁看的,给“普罗大众”?然而仔细一思量,他心目中的读者就只有受过教育的甲类读者。

严复也是如此。在梁启超委婉地批评他文字太过渊雅,读者不多的情况下,他断然说“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罗新璋 1984: 141)。在他看来,翻译中要完全照顾到赞助人、读者以及自己的利益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 3 方分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处于同一文化环境中的赞助人和读者由于双方需求以及侧重点不同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严复作为一名典型的士大夫,把上层社会或统治阶级当成“学生”,希望把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渗透给他们,通过“教育”自己的“学生”以达成“治天下”的主要目的。Lefevere 也认为,不同类型的读者会要求有不同类型的翻译。用歌德的话说“假如你想影响大众,简单的翻译将是最好不过的了。与原文竞争型的批判性翻译实际上只对那些学者的谈论起作用”(Lefevere 2004: 6)。

### 2.2 商客关系

由于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手工业取得一定的进步,城镇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到了清末,城市的发展,吸引了部分士绅进入城镇生活,他们的经济活动自然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城市化对经济依赖的增加以及社会对商业价值的越来越重视,促使了处于传统社会中“四民之首”的士绅向他们曾不齿的“四民之末”的商人靠拢,王韬就是一例。同时,商人为政府和士人在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兴利的思想也逐渐在士人中形成。

清末城市经济的发展,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可以带来利润的商品。译者作为产品的生产者,甚至有时是产品的推销者,他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商客”关系。此类关系完全把翻译产品当成商业运作的结果。译者变成了商家,读者成了顾客;顾客是上帝,译者想尽各种办法争取顾客。译者要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才能处于胜利的制高点。作为商人的译者,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读者的购买动机才能通过市场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译文销售出去。

读者购买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任何人从事任何活动都有一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的行为动机。清末翻译产品的大量增加,得益于读者的各种内在动机。清末读者购买翻译小说的动机很复杂。大致说来,主要有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追求翻译的实际使用性;赶时髦或者追赶名人,最典型的莫过于林纾的小说了;只为精神享受而购买翻译作品。这一部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思想水平而买书。他们大体上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指向和目标,看到什么中意就买什么,随机性较大。这些读者有大量资金,买得起书,也有大量的时间来看书,属于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士人”阶层。孙宝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每天的日程基本上就是逛书店、买书、看书。

清末都市迅速崛起,印刷技术比较先进,出版业比较发达,市民文化水平相对提高,阅读小说逐渐成为推广和普及的娱乐方式。有趣的是,清末翻译是先有读者和市场再去进行翻译,而不是先有翻译产品然后再去进行营销推广工作。包天笑对自己经历的回忆在当时应该很具有代表性。他说“所以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面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译,后来也有创作了。但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难免受了林译小说的熏染。我起初原不过见猎心喜,便率尔操觚,谁知后来竟成了一种副业,以之补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包天笑 1971: 175)。清末高涨

的阅读热情催生了很多类似包天笑这样的翻译家。在当时,从经济上讲,阅读小说对于普通市民更为节省,一般剧团的剧目票价在二角到四角之间,吃花酒或许会更多,但是一册翻译报刊、杂志的售价只有一角,由此可以推测,清末普通市民还是可以承担这笔费用的。

作为“商人”的译者,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投入阅读,他们不得不努力迎合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期待视野。很多译者翻译时把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抹去了,把外国文本吸收进目标语文化主流价值观,使之获得大家认可(Schäffner 1995: 10)。1907年《小说林》社第一期就登载了募集小说的广告“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 每千字五圆,乙等 每千字三圆,丙等 每千字二圆”(陈平原 夏晓虹 1997: 257)。1908年《月月小说》编译部发布了征文广告“本报除同人译著外,仍广搜海内外名家。如有思想新奇之短篇说部,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利益”(陈平原 夏晓虹 1997: 345)。

从以上这两则商业广告可以看出,译者必须在选材和翻译语言上符合市场读者的需要才能获得利润,获取最大利润逐渐成为大多数译者追逐的最终目标。包天笑抓住时机,用其所长“重写”了《空谷兰》和《梅花落》两本日本小说,由有正书局出版,曾轰动一时,电影公司曾把它们搬上银幕,其经济效益可见一斑。从《小说林》社的销售量也可以看出,士人昔日作为“师者”的身份逐渐丧失,“商人”的身份却日益得到加强。

### 2.3 朋友关系

还有少数译者把读者当成自己忠实的朋友和听众,这类关系在清末并不多见。其翻译目的就是把不懂外文的读者让渡到彼岸,充分欣赏外国风情,了解异域文化。因为,翻译作为文化超越的过程是一种重要的形成文化身份的方式(Schäffner 1995: 10)。在清末,从选择文本到最后书写译文,译者都把读者放在第一位。这种书写的过程在翻译文本生产、发行和接受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产生作用,最重要的影响则是促使读者文化身份的形成。

在这样的关系中,译者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权利为目的,自觉选择适合译文读者口味的文本,再用适合他们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译者的任务和责任就是充当两种文化的媒介,让译文读

者在译者的引导介绍下逐渐由抗拒异国文化到接受的过程。在这类关系中,译者特别重视读者的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真正关心他们的期待视野、欣赏水平和兴趣爱好。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获得他们的认同,林纾凭借自己中国文学的功底,在译本书名上下足了工夫。有的译文书名以清新雅致、富有诗情画意取胜,如《玉雪留痕》(*Mr. Messon's Well*, 1888),《橡湖仙影》(*Dawn*, 1888),《红礁画桨录》(*Beartrice*, 1890)等,有的以惊险、刺激、暧昧吸引读者,如《三千年艳尸记》(*She*, 1886),《鬣刺客传》(*Uncle Bernac*, 1893),《玉楼花劫》(*Le Chevalier De Maison-Rouge*, 1846),《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 1825)。此外,林纾还根据故事的情节来给译文取名,如《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 1852),《贼史》(*Oliver Twist*, 1838),《薄幸郎》(*The Changed Brides*, 1869)等。尽管当时民众阅读水平低下,真诚的林纾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引起国人对西方的兴趣,进而促进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一本本翻译小说的问世,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了解和认识西方社会的窗口,读者将会因此增长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风俗、伦理、民情、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不自觉地参与构建一种文化身份。因为在他潜意识里,文学翻译即使不是为了大众,至少也会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一定影响(Lefevere 2004: 5)。林纾的翻译在促进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所起到的间接作用和诱发作用,钱钟书、鲁迅以及后来的很多文学家都曾有过阐述,可见其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之大。

### 3 结束语

事实上,由于清末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译者与读者关系并不如上述情况那么分明。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比如严复和上层统治阶级);既是朋友关系又是商客关系(比如林纾与广大市民读者),呈现出特有的复杂性和过渡性。但总体说来,清末的

译读关系由过去传统的“师生”关系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关系过渡。随着政治热情的消退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翻译的工具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译者逐渐把它从“政治”工具转变成了“经济”工具。但是无论关系怎样,读者是译本的最终消费者。不管译者出于何种目的,实现什么样的价值观,都无法忽视接受译本的读者。译者应该把读者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关心他们的阅读水平、期待视野以及心理需求,在译本中充分考虑译本的文本选择、文本所用的语言以及翻译方法和策略,因为任何文本都是为了了一定的读者而生存的,如果文本失去了读者,它存在的价值也会随之消失。

### 参考文献

-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 大华出版社, 1971.
-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涂兵兰. 清末译者翻译文本的伦理抉择[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1).
- 周作人. 周作人回忆录[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Alvarez, R. & M. Carmen-Africa Vidal.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Nord, C. *Translating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Schäffner, C. *Cultural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C].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
- Tymoczko, M. & E.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Powers*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